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吴海勇 著



SHIWEI GONGWUYUAN DE LUX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SHIWEI GONGWUYUAN DE LUXUN

吴海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5633-5496-4

I. 时… II. 吴… III. 鲁迅(1881~1936)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9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7.5 字数:24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册 定价:24.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鲁迅在 1912—1926 年 / 1

第一章 “海归派” & 公务员 / 9

归国后的颠沛经历 / 9

何以做了公务员 / 18

从南京到北京 / 26

第二章 公务生涯 / 33

在京 Office 的体验 / 33

初证政界争斗 / 45

日常公务行为 / 52

上班制度 / 60

关于薪俸 / 67

第三章 从政优胜劣汰纪略 / 77

公务才干勤绩 / 77

晋谒、奖励及裁员风波 / 102

公务资源 / 110

沉沦下僚的缘由 / 121

第四章 上司与同事 / 127

年节欢宴、赠书与送礼 / 127

与上司的周旋 / 135

同事兼朋友/145

同事的学养禀赋/156

友情之考量/163

第五章 并不敷用的公余时间/170

居所衣食等等/170

亲戚与朋友/180

辑录研究/193

写作、翻译及文学社团/201

授课讲学等活动/210

第六章 器质性不合时宜/220

office 恶俗、小人及邪径败德/220

不得已参与的祭孔仪式/228

去职经历与索薪活动/235

支持女师大学潮/241

状告上司章士钊/256

结语:走出教育部之后/269

后记/274

主要参考书目/275

绪论：鲁迅在 1912—1926 年

“公务员”一词，早见于民国时期。实际上，民国时期是我国试用公务员制度的初级阶段，而鲁迅是此项制度的先行实践者。

从 1912 年到 1926 年，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既而进京入北洋政府，为教育部部员，供职于政府部门。鲁迅度过了他的 32 岁至 46 岁的大好时光。

然而，鲁迅做公务员的这段经历，相关著述一般只是用极少的篇幅述及。究其原因，无非有二：

一是鲁迅任职于教育部的经历，缺少显在的见证，如曹聚仁所言：“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提到他的‘提倡美术’……此外提到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时，实在很少。”（《鲁迅评传》）

其二尤为关键，鲁迅研究者似乎觉得，鲁迅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不仅毫无意义可言，而且还有损于这位文化伟人的光辉。因此，对这段时期，他们主要聚焦鲁迅后 8 年的文学活动。如是，研究者的集体缄默分明带有为尊者讳的意味。

知识界对官场的鄙薄可远溯到《左传》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学人的这方面倾向得到新的强化：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对权柄的传统依恋，另一方面又畏惧自身的异化。蔡元培组织学界“进德会”，倡导知识分子不做官，便是极端的例子。身在仕途的鲁迅不得不面临这种尴尬，特别是当他进入北大等北京高校兼课以后，好比是一只白乌鸦飞进了喜鹊窝，怎能不引起些许噉噬？尽管鲁迅并不张扬他的官员身份，学生还是很快得知这位教师的来历。高长虹日后借此大泄私愤：“他的教育部的职业，我同几个青年朋友们初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又很

好笑。”(《一点回忆》)但同时他又掩饰不住对鲁迅官俸的垂涎;忠厚的许钦文直言而言:“因为你早就留了胡子,而且在机关里办公……”(《鲁迅日记》中的我)

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具有留学英美经历的东吉祥胡同“诸君子”打笔仗时,鲁迅的官员身份更是被对方恶意热“炒”。陈西滢在《致志摩》中特意补充道:“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金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就很有点揭去伪装,公开示众的味道。当鲁迅被章士钊非法免职后,对手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乘势冷嘲热讽,攻击鲁迅是因为失去了“区区金事”而反对章士钊,并非出于公心,“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鲁迅针锋相对:“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派我做学者。”(《“碰壁”之余》)鲁迅坚持自己的官员身份。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复课,在新学期的开学仪式上,鲁迅发言,郑重声明:“我不是专门当教员,是做官的。”那个时期,丢了官帽的鲁迅勇敢地挥舞他个人的官家小旗。

鲁迅对自己公职身份的态度是复杂的。

被非法免职后不久,鲁迅就在信中向台静农袒露心扉:“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1925年8月23日)

初入政府部门时的热望与憧憬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政府所作所为着实让他失望,鲁迅渐次游离官场文化,重新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官职不过是他的饭碗,衣食所在而已,鲁迅的大实话足以让论战对手自感虚伪:“目的是在弄几文棒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不是信》)如是,政要的变更与他何干?更何况鲁迅早与官场作风不谐,并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过,也曾在张勋复辟时从官场暂时出走,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弃官辞职的充要条件。然而,一旦成为文化名人,并公开表示自己对官场的批评之意后,鲁迅加剧了灵肉的分裂,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缓慢游离官场文化的过程中,鲁迅开始渐渐看不顺身边人在仕途上的努力。1924年,孙中山北上,拟开善后会议,共商南北政府议和大事,鲁迅的好友杨莘耜任善后会议秘书,为此常与代秘书长许世英及安福系政客在一起。有一天,鲁迅遇见杨氏,半含讥讽地笑说:“你现在奔走权门了!”

从此，二人关系疏远下来。彼时鲁迅对积极仕进者可谓是异常的敏感，他在 1926 年 6 月 26 日所作的《马上日记》记道：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文中所说的“织芳”，就是鲁迅的学生荆有麟；“方糖”应为“霜糖”，因为荆有麟来去匆匆，仓促所言，鲁迅误听所致。鲁迅猜得真准，没到一年，荆有麟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办起了报纸。此后又两次央鲁迅写举荐信，寻求进身之路。

但是，自己鄙夷官场，甚至不愿继续为官，是一回事，被上司非法免职是另一回事。鲁迅依靠法律坚决维权，对于陈西滢之辈的流言飞语则予以痛击。

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复校而告胜，状告章士钊的官司也打赢了，但是东吉祥胡同诸君子仍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又揪住鲁迅的官员身份说事。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起首就给鲁迅贴上了“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的标签，他又讥评林语堂所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中的鲁迅形象：“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这就将思想之争上升到人身攻击。以下便是大揭老底：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讨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金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至于“代表无耻的

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什么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文章牢牢锁定鲁迅的为官经历，予以多角度地攻讦，目的就是要毁坏对方的名誉。

鲁迅不得不作出反击，针对所谓“袁世凯称帝”等时期有关名节问题的指摘，他如是回复：

“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也没有希望国民军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不是信》）

此节有批评，有解释，有澄清，亦不忘讥讽，比如“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云云，就直刺对方只知坐而论道，一味苛责。然而，接下去一段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鲁迅深知论敌的偏见颇得社会的认同：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于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金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鲁迅继续申辩，这回更多地将自己与陈源的情形作对比：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是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

逼近文末，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手好一顿贬损。教授还不是拿国家的钱过活，脱不了同政府的干系（附带言之，陈西滢所说的“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无非是因为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引起蔡元培辞职抗议，由此酿成学界的“挽蔡驱彭”运动，说到底还是经费紧张的缘故，上升到人格攻击未免过分）。在宵小当政期间，衡之以陈西滢的思路，做教授就清白了吗？笔墨所剩无多，鲁迅也顺带着评点了一下陈西滢的尊容，以示平等：

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

就不可多得了。

谁让陈西滢对鲁迅恶意评头论足来着？

这是鲁迅与陈西滢论战的最后回合，陈西滢在那篇文末已表明息战的态度。令人不忿的是陈氏既表明不愿再惹笔墨官司，而其所列理由又在鲁迅战栗的心灵上重重地划上了五六刀：

第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闲功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

鲁迅的公职身份再度成为受攻击的对象。“闲功夫”云云，表明他自己是靠本事吃饭，而鲁迅这样的官员是吃闲饭的，说白了，就是国家的蛀虫。

好在鲁迅在文学创作、社会批评、学术研究等多方面的建树，以及日后卖文沪上的经历，足证他可凭借卓犖的才华自养，而陈西滢日后做了十余年武大文学院院长，忙于行政管理，少有著述，好像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本来嘛，忠于国事，岂有罪乎？

即便是陈西滢就此收口，也不意味着鲁迅从政“原罪”的观点就此失效。

飞短流长在鲁迅身后亦未终止，郑学稼在1942年出版的《鲁迅正传》中，为了击破“鲁迅神话”，再度瞄准了鲁迅为教育部佥事的那段经历。郑氏苛责鲁迅“于赵秉钧（袁世凯私人）代国务总理的期间，升为教育部佥事。此后，总统、国务总理及教育总长，时有更迭，而我们的周树人先生的‘官’，却未曾摇动”，其攻击路径与陈西滢同，但因运用了学术语言而愈加气势汹汹：

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北政府易大总统六，摄政二，临时执政一，计被称为“元首”的六人（重复不计）中间尚有一个“洪宪皇帝”。至于教育总长，可考的，在这十四年中，先后更易的计二十七人。在那多变的北廷中，一个人能够久任官职，虽属“金

事”之类的小吏，亦为难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抱着“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那龌龊的世界中，神圣的革命者，是无法一日安居其位的。

鲁迅曾以他在张勋复辟期间辞职来自我辩护，郑学稼如此讥评：

再就这十四年的政治现象说来，首先是袁世凯推翻民国，改元“洪宪”，我们的“金事”并未表示他的赞成或反对；但依“年谱”的记述，当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时，他却为着辫子留在北京，“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然而，在北廷许多离奇政象中，他也仅仅“愤”了这一次，似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对他都没有感觉——更谈不上“不满”了。因此，对承认二十一条的政府，他可以充当小官，对“猪仔议员”所选的总统——曹锟——可以承认为“元首”，对军阀所拥戴之“外崇国信”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也可以默认。

就这样，郑氏通过苛责鲁迅在历次政治事件中明哲保身化解其在张勋复辟时的正义之举。“为着辫子留在北京”云云，仿佛鲁迅那次辞职，仅仅是与辫子军势不两立。

在郑学稼眼中，在北京期间的鲁迅充其量“只是一个宦途不利的‘金事’，只是一个具有成功条件的文学家”。于此郑氏一厢情愿地使周树人与鲁迅实现了人格分裂，鲁迅对黑暗势力的抨击缘于周树人在官场的黑暗经历，而鲁迅的光明面并不能照亮周树人的“墨墨黑”：

超过“不惑”之年的周氏，还未曾成为一个革命者，只是北廷似苍蝇的官僚群中的一员。我们十分明白，在那样腐化的北京官场中，周树人氏能混了那么久长的时间，是不容易的。他是否在那迎张接李似的生涯中，和一般官僚表演了奴颜婢膝的丑剧，只有他的同僚晓得。但是，我们却不能专门用这事实估计他，恰似他是周树人兼鲁迅，所以，他的生活也有黑暗与光明的两面。如果说：周树人是代表黑暗，那在鲁迅的著作中对于旧势力的——

憎恨,却是代表光明。鲁迅所以能够成为黑暗势力以及反抗者,为着他周树人:周树人冗长地被侮辱被压迫的生活,使他假鲁迅之口中,排泄出反抗的气愤。因此,我们在周树人的生活中,见到向卑劣者屈膝敷衍等暗影,而在鲁迅的“杂感”中,却面对映现那些人类不该有的事态的光芒,只有被侮辱的人方知道对侮辱的反动,只有被压迫的人,方明白对压迫者的反抗。所妙处,现在青年,只晓得鲁迅在各方面的光明,而不知于他的黑暗。

有幸的是,鲁迅当年的同事为我们保留了吉光片羽的记忆,可证鲁迅之清白。针对陈西滢“诬枉鲁迅先生对于北方官僚的妥协敷衍,说鲁迅先生在袁贼倒行时代,始终安居教育部”,林冰骨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挺身辩护:“就我记忆所及,知道那时鲁迅先生是表示过愤慨反对的。从此,更可见出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

此外,鲁迅在教育部的行事亦有案可查。1979年出版的孙瑛《鲁迅在教育部》一书,着力整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业绩,意在回应对鲁迅供职于教育部的种种偏见与污蔑。然而,认为鲁迅是有意涉足政界观察统治层黑暗以反戈一击的说法,现在看来实在是多余。

鲁迅最需要的是“同情的理解”。

不应无视公务员是鲁迅那时期第一身份的事实。

公务员,顾名思义,也就是直接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试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舶来品”,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又转受中国科举取仕传统的启发,缘此公务员原本是中国士人的势力范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鲁迅如何就不能做这个“官”?任职教育部十数年而最终离去,鲁迅实在是民国早期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

扭住公务员这一核心,鲁迅在北京(主要是在北京)的日子便能还原其本来面目,他的生命意义必将得到全新的索解。

第一章 “海归派”& 公务员

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鲁迅《致许寿裳》，1911年7月31日

作为中国早期的留学生，鲁迅所作所为不同凡俗：他在日本放弃了学到一半的医学文凭，此后也没有再去钻研“热门”专业，他收获的是“文学的自觉”。可恨写作未能大获成功，文字不能锅中煮，鲁迅怅然归国了。依旧书生意气不改，结果是处处碰壁，“所至颠沛，一遭于杭，再厄于越”。辛亥革命为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但这得多谢许寿裳这位挚友，还有蔡元培这位“命中贵人”，使鲁迅得以先入南京临时政府，既而进京为教育部部员，开始崭新的公务员生活。

归国后的颠沛经历

日本在鲁迅心目中留有美好的印象，这并不是说他在日本没有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主要倒是因为归国后的遭遇还要糟糕得多。在留学期间被骗回家奉命成亲，就已造成了鲁迅一生的不幸。1909年归国后，又谋食不易，托关系进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却因为参与驱逐新任监督夏震武的“木瓜之役”而不能久待，于是只好回乡教书。正当他厌恶了绍兴府中学堂的教学行政工作时，辛亥革命不期然地爆发了，对新生活的憧憬激发了鲁迅的活力，但很快又使他处于失望的边缘。所幸的是有好友相助，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为他带来新的希冀。

留日而归国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1931年鲁迅将赠诗书成条幅，送别日本文学青年增田涉，笔墨间透着对东瀛扶桑的无限依恋。

是啊，日本捆绑着鲁迅的青春记忆，求学经历虽然艰辛但确曼妙，何况又是在极富异邦情调的别国他乡。自1902年东渡扶桑，鲁迅在日本滞留了将近七年有半，那可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鲁迅没有虚掷他的青春，前两年在日本弘文学院学语言，中间两年到仙台专门学校学医，苦读间隙仍不忘游名胜、探遗迹，决意弃医从文后，他以学德文为名寄挂在“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而大量时间则是伴着火热的文学梦博览群书、笔耕不辍。

这期间鲁迅数度回家度假探亲，1906年是在母病速归的电催下火急赶回，谁曾料到家才知是落入了母爱设下的圈套。与朱家姑娘的婚事，母亲早在鲁迅南京求学期间就已提起。此次则要这位周家长子应命成亲，这之于鲁迅无疑是滑稽与荒谬的，然而念及无依无望的家母，抑或内心尚存一线侥幸，鲁迅这回没有违逆。然而，新人覩面却大失所望，连母亲、周氏二兄弟事后都有吃亏上当的感觉。洞房花烛夜，鲁迅与新娘子同房，这应当是这对夫妻唯一一次象征性的合卺仪式。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鲁迅次日晨起，发现自己的脸被廉价的蜡染布染青了一大块——是的，鲁迅很生气，可以想见他铁青着脸走出了新房，第四天就带着已被批准赴日留学的周作人离开了家门。

既然“灵台无计逃神矢”（神矢，即所谓爱神丘比特的神箭也），更加“风雨如磐暗故园”，婚姻又不如意，鲁迅本意是要将留学的时日拖延得越长越好……

然而家中难以维系的经济状况，加之周作人恋上日本女子，预备结婚需要花费，迫使鲁迅从日本启程，回归故里。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所说：“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其实是夫子自道。1909年8月，在从日本航向中国的轮船上临风站立着一位“海归派”，他瘦削的脸上留着两边上翘的唇髭——这种蓄胡样式虽然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然而在那个时代近乎成为日本男人的标志——假辫子是装上了，但掩饰不了在日本习染的异域气质，所有这些都使鲁迅看起

来更像个日本人。十几年后,鲁迅如此回忆那段往事: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说胡须》)

这是“海归派”可能遭遇的尴尬,让鲁迅终生难忘。

归来了,却是一点也不觉得轻松。养家糊口、振兴家业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到了这位周家长子的身上。

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鲁迅回来得及时,暑假终了,他翩然而至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去了。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筹办于1906年,由初级和优级两部分组成,故称“两级师范学堂”。原来鲁迅早托先行归国的许寿裳设法谋职,许寿裳4月间归国,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他向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荐举了自己这位好友,“一荐成功”。得此教职,这是鲁迅第一次领受许寿裳的恩惠。

但若是细究起来,又不免让人愤愤不平。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主讲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和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兼博物学、植物学日籍教师铃木珪寿的翻译助教。鲁迅绝不尸位素餐,他编成生理学讲义,许寿裳题曰“人生象教”。有一次他应学生之请加授性学知识,自印讲稿,让听讲者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教化学则是凭借着他当年在南京就读江南路矿学堂的知识积累,一次示范做点燃氢气的实验,被淘气的学生偷偷地放入空气,炸得他满手是血。

照理说,身为“海归一族”进学校境遇原本应该好一些。

特别是清末那几年“海龟”利市看好,清廷打出了变法自强的招牌,延用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一朝废弃,而海外学位得到朝廷的认可,许给相应的官职。当年鲁迅就读江南水师学堂,母亲还哭哭啼啼,以为“功名”再无前程,又将良心卖给了“洋鬼子”,此生休矣。没想到若干年后鲁迅考取官费

留学日本,正是走上了一条让时人倾羨不已的康庄大道(当时同行者如陈师曾、陈寅恪者,还是自费留学的)。1903年,鲁迅同一班留学同乡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号召有志青年走出稽山镜水,“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以“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此时的鲁迅俨然为留学的先行者。

留学日本形势发展迅猛,由于费用节省,地理、文化接近,清政府致力于将公费留学生派往日本,并因此带动了大批自费生。1896年首批赴日留学生仅为13人,1901年增至274人,1903年则为1300人,1905年猛增为8000人,1906年、1907年突破万名,分别为1.2万人、1万人。然而,留日学习不定资格,未经考试,所学专业随意而定,成绩优异者寥寥无几。就在1906年,清廷举行首次留学生归国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者都是欧美留学生,应试的留日生集体性地名落孙山。经此竞争,留日生的“行情”明显不及欧美留学生。到鲁迅归国的那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锐降至3000人。在日本留学者或转赴欧美,或者早早地回国就业,鲁迅归国何其迟也。

说到底,回国晚了还不是择业难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鲁迅在日本并没拿到像样的文凭。鲁迅在日本所得两纸文书:一为弘文学院日语学习证书,另一是在仙台学医两年的经历证明,都算不上过硬。记得鲁迅在好友范爱农沉水去世后曾对人说起范氏如何的不合时宜,到日本求学不上名牌大学,所读专业又甚为褊狭。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鲁迅与爱农何其相似乃尔,且其纵意率性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决定了鲁迅独往偏僻的仙台学医,眼看学业过半又中道舍弃,此后索性不受专业的拘束,单想凭着自己的一支笔驰骋天下。

尽管没有担任主课,鲁迅对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大体上还是满意的。

学人与学校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何况清政府学部早于1907年明文规定,官费留学生回国后必须担任专门教员5年。在此政策作用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收罗了不少留学生,上至校长下至教员,大多是从日本归来的“海归一族”,如张宗祥、杨莘耜、张协和、钱家治、朱希祖、夏丐尊等,混迹其中,分明还是在海外求学的朋友圈子里转悠,他们每周总要在鲁迅住处搞一次“饕餮”聚餐。再看五十几岁的男人还混在学生队中举着哑铃做早操,鲁迅不禁微微地笑了。

谋食杭州的日子,鲁迅闲时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又